



*Kant*

舒志锋 单正平 著

康德

与

尼采  
美学之比较研究

*Nietzsc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83-095.16  
14

014033040

舒志锋 单正平 著

*Kant*

康德

与

尼采  
美学之比较研究



*Nietzsch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83-095.16

14



北航

C172122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德与尼采美学之比较研究 / 舒志峰、单正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161 - 3916 - 5

I. ①康… II. ①舒… ②单… III. ①比较美学—康德—I.—1724 ~ 1804、尼采—F. W. —1844 ~ 1900 IV. ①B83—095. 16②B516. 31③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1567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2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55. 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康德、尼采与认识型的汇通	(18)
第一节 康德与现代认识型	(18)
第二节 尼采与当代认识型	(25)
第二章 先验、超验的区隔与权力意志的扩张(上)	(38)
第一节 康德的先验哲学	(38)
1. 康德哲学的先验、超验的区隔	(38)
2. 康德哲学的先验性及其演绎	(41)
第二节 先验立场:康德美学建构的内在之维	(55)
1. 审美判断的先天原则: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	(55)
2. 美与崇高的主观合目的性分析	(65)
3. 美学合法性的确立与美学问题的凸显	(73)
第三章 先验、超验的区隔与权力意志的扩张(下)	(79)
第一节 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	(79)
1. 康德、叔本华与尼采	(79)
2.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85)
第二节 权力意志与希腊悲剧	(105)
1. “永恒轮回”中的酒神因素	(105)
2. “权力意志”中的日神因素	(112)
3. 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之死	(120)

<b>第四章 康德主体先验化与尼采主体的权力意志性</b> .....	(131)
第一节 康德与尼采的主体论 .....	(131)
1. 康德哲学的先验性与主体性 .....	(131)
2. 权力意志与主体 .....	(139)
第二节 康德美学中的主体问题 .....	(150)
1. 审美判断的主体性 .....	(150)
2. 美的艺术与天才及鉴赏之关系 .....	(159)
3. 康德与浪漫主义的兴起 .....	(168)
第三节 尼采美学中的主体问题 .....	(185)
1. 审美状态与主体消解 .....	(185)
2. 艺术的“伟大风格” .....	(196)
3. 尼采反浪漫主义 .....	(206)
<b>第五章 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b> .....	(224)
第一节 “人”的生与死：“现代认识型”的始与终 .....	(224)
第二节 《判断力批判》与先验人类学的建构 .....	(238)
第三节 《悲剧的诞生》中的敌基督因素 .....	(246)
<b>附录 福柯：人文科学考古学意义上的认识型</b> .....	(256)
<b>主要参考文献</b> .....	(279)

# 导 论

## 一 关于西学的认识和理解

西学即是指来自欧美的学问，涉及知识、思想、宗教、技术等各个方面。西学在明末清初又被称为“天学”，晚清又以“实学”名之。<sup>①</sup>不同于来自其他地域的学问（如来自印度的佛学），西学极深地参与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甚至可以说，西学东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其“侵逼”与“冲击”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尚未完成，西学对于中国的塑造与影响仍在继续。从思想观念层次看，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学、史学及哲学这三个学科的渗透来实现的。这三个领域中每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诸如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对象的更新，研究意义的开显，均受西学的影响甚深。在研究的理路与范式层面尤甚，以至于有学者担忧我们都不会按中国人本有的思维方式来言说与思考了。显然，在如此语境中，完全抛弃西学的理路，是不可能了，诚如王国维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sup>②</sup>而为西学的思想观念提供根基的，首推哲学。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浅，基本上可以视为对西学接受层次高低的标志。事实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对近代中国的

<sup>①</sup> 邹小站：《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sup>②</sup>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sup>①</sup>

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然而对于西学的理解与诠释却仍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三个层次：（1）对西学哲学经典的解读仍然十分粗疏。经过近百年的译介之后，西方大部分的经典都已经就绪，但对我们对西方大哲著作的解读，仍停留在述评的层面。刘小枫认为：“西学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有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sup>②</sup>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及“拿来主义”，使得我们在面对西方各种思想观念的时候，并不首先深究其学理，而是看其是否合于当时社会思潮。在现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中，五四知识分子对西学的接受并无从容的学理研究，而大多摘取一二观点，作为前行与变革的支撑。这样做固然有迫于时代形势的紧张与急峻的理由，却也容易遗其神而仅得其形，只记得西方的各种“主义”，西学的精髓与奥义却未能识得。时过境迁，如今，“救亡”被“稻粮”更换，“启蒙”为“博名”代替，学风空疏却依旧，真正立足经典来解释经典，回到原著来阐释原意的学人，经过细读与潜沉而得来的学问，少之又少。（2）学科建制意义上的西学始终地位尴尬，“西学无学”。这主要表现在，西学在大学教育中大体还局限在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这个很狭窄的领域内，其他专业学生对西学的了解和研习相当有限。（3）在个体精神生活层面，西学也并未成为中国安身立命的思想泉源，大多数学人对之采取的是“借用”与“资取”的态度，西学并未成为一种具有根基性的精神力量。

深化对西学的了解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对经典，但是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中，西学经典接受的状况都不容乐观。这与我们大而全的大学教纲的基本设计有关。在国民教育系列的顶端——高等教育部分，课堂上充斥的大多是通史、概论，经典文本的阅读基本被边缘

<sup>①</sup>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西学东渐研究》第二辑，“编者的话”，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

<sup>②</sup> 刘小枫：《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之“缘起”。

化。教材式的书写面面俱到、平均用力，难以将经典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况且再优秀的教材，也代替不了对原典的阅读，教材里经过编者过滤挑选，虽然力求公正与客观，但也难保留经典的韵味与原貌。刘小枫认为，通过概论与通史，获取的只是“虚假”的满足。修这样的课程，很多人就是读到硕士、博士阶段也没有读过几本“硬书”。长此以往，性情如何滋养？生命如何得到醇化？人文如何得以赓续？

经典的被边缘化，除了教学大纲基本设计的导向作用，也与国人趋新逐流的心理有关。“最新的就是最好的，古旧的则肯定没有生命力”，在这种“现代”意识的主导下，经受漫长历史考验的经典，反而成为最该抛弃的，至少可以存而不论。在国人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愿望驱动下，学人不断地追逐西方最新的时髦理论，一直从现代追到后现代，从未认真回到原著阐发原意。在后现代理论的氛围中，经典或被指责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共谋，或被认为是文化权力争夺的场域，总之是要被解构的对象，而且应该大加挞伐。

五四以来的激进与功利的立场，使得中国学人一直未曾好好审视这些经过百千年时间考验的文字；在新的“功利”与“效率”为最高衡量标准的时代背景下，经典教育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更是遭到极端的忽视乃至鄙夷。但是后学天素之保育、英华之培发，离不开经典的阅读；当今大学生精神气质之粗糙、人文素养之浅薄、性情做派之乖戾，恰恰是长期轻慢、抛弃经典的结果。

西学经典，不局限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代经典，也包括在此之后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但回到经典不一定就能读懂经典。阅读经典的方式与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从原著阐发原意、细读与深耕文本，是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国内，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学术略具规模，集中表现在对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哲学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的翻译研究虽然粗浅，但主要对象和问题均已涉及。我们认为需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读经典，发掘主要经典作家的深层思想，梳理他们彼此间的影响与联系，结合当下中国重大精神文化现象，作出我们自己的解读和创造性诠释。

以上考虑，决定了本书选题和思考路向。

## 二 为什么选择康德与尼采

本书选择康德与尼采展开比较研究，是因为：其一，此二人对现代中国影响很大，康德哲学最近30年来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是通过李泽厚等人的诠释来实现的；尼采思想则影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sup>①</sup>，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此种影响迄今未见有衰退迹象。其二，此二人哲学美学极具深度与挑战性，具有最大解释空间，对此二人的误读也最多最大。其三，此二人哲学美学在中国研究最为深厚丰富，初步形成学术传统，有相当的基础可资推进，不致形成脱离学术传统的自说自话。

更为重要的是，从学理角度而言，通过对康德与尼采哲学、美学经典文本的细读，实现对西方哲学的根本性特质的把握。康德与尼采在哲学基本观点上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对立性。康德哲学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所谓“先验”即是普遍必然的存在；而尼采的哲学则具有鲜明的“生成”性质，“酒神世界观”、“永恒轮回”都指向否定持存、超越自身。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是一种柏拉图主义，而尼采则将柏拉图主义视为最大的敌人。康德哲学延续了笛卡尔以来的意识本体论，将意志视为一种主观意识，虽与知性认识能力决然有分；而尼采则受叔本华的意志本体论的影响，以意志来主宰知性，打破了康德现象—物自体的哲学框架，意志充满了僭越性及扩张性。康德哲学的先验性与思辨性，张扬的是西方精神中的“灵”的一面，尼采哲学的身体性与情感性，凸显的是西方精神中“肉”的一面。康德与尼采的这种对立性，再次印证了西方哲学是一种“用极”思维的哲学。张志扬将西方哲学的这种“用极”状态表述为：在“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主义之间的二极摇摆，呈现的是一个间距。<sup>②</sup>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间距性的存在，康德与尼采恰好是此间距的两个端点。所以，康德与尼采的哲学与美学可以看作是现代

<sup>①</sup>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载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1页。

<sup>②</sup> 张志扬：《偶在论谱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西方哲学与美学的两种典型样态，以此为切入口，可对现代西方哲学与美学进行一种本质性的把握，这也是我们对康德与尼采美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根由，而据我们所知，国内还未曾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

### 三 康德尼采研究总体述评

康德与尼采学说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而传入中国的。其学说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为五四前后到 1949 年，二为 1949 年到“文革”结束，三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最早介绍康德星云假说的人是康有为，康德学说最早的传播者与鼓吹者则是梁启超。他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康德学说的论文，该文发表在 1903—1904 年的《新民丛报》上。他把康德哲学与中国佛学、王阳明心学糅合在一起，“相互印证”、“共相发明”，对此贺麟评价道：“他用他不十分懂得的佛学去解释他更不甚懂的康德。”<sup>①</sup> 梁启超同时也是尼采学说最早的论述者，他在 1902 年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 18 号，1902 年 10 月 16 日）中讲道：“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笔者注）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即尼采——笔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在梁启超之后，对康德学说作过评介的有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民报》，1906 年）一文中，从佛教“舍阿赖耶识”的角度对康德的先验范畴及先天直观形式（时空）做了自己的阐释，虽然从现在看来，章太炎的此种解读明显是一种误读。对于康德哲学与叔本华、尼采哲学，王国维都接触过，对前者他发出了“可信者不可爱”的感慨，对后者他又认为“可爱者不可信”。为了读懂“几全不可解”的康德哲学，王国维不得不先取径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将此书读了两遍，扫清了通往康德哲学的一些关键性障碍，然后

<sup>①</sup>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 1944 年版，第 28 页。转引自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0 期（1998. 12）

“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王国维，《三十自序》）。王国维将自己阅读康德哲学的所得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外观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灿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在能知，不存在物”（《汗德象赞》，1903年）。在这首诗中，王国维讲到了先验直观形式——外感官（空间）、内感官（时间）；知性的先验范畴（“知物之式”）及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区隔这些康德哲学的基本命题。蔡元培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源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启发。蔡元培在《美学的进化》一书中已经讲到由于康德将人类“知性”与“意志”设定为相互无涉，这造成了“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决然分隔，为了调和人类的这两种“性质”必须诉诸“由快不快的感情起美不美的判断”，也就是说，《判断力批判》的使命，即在于沟通人类的这两种基本能力。据此蔡元培认为美学能够达到最高的精神统一境界，“融合划分人我的偏见”，从而可以替代宗教的功能。

这个时期诸家对于康德哲学的接受，大都出于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的现实需要，欲以康德的理性精神来涤荡国人心智中的蒙昧，从而为民主与科学的传播提供前提条件，“他们抓住康德精神影响世界的精要，看重的是思想解放的冲击力”。<sup>①</sup>但是限于时代环境及学术的积累，这些得风气之先者的思想，还未成熟到能够完全理解、参透康德哲学的精髓，他们“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囫囵和隔膜，只能借助本土文化辅以推想，未能深入领略西学之堂奥”<sup>②</sup>。

贺麟认为，1949年之前康德哲学研究的高潮是在1924—1925年间。“这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的，因为康德的知识论是和科学有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的知识论。”<sup>③</sup>1924—1925年，以纪念康德诞生200周年为契机，当时的学界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研究的论文，它们主要集中在《学艺》杂志上发表，涉及康德的“知识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审美哲学、自然

<sup>①</sup> 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年第4期。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贺麟、洪汉鼎：《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贺麟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载《西学东渐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哲学、社会主义、和平论、目的论、教育论、宗教论、时空论、天体论、运动论”<sup>①</sup> 等各个方面。1925 年 4 月，《民铎》杂志紧随其后，以“康德号”专刊的形式继续深化对康德哲学的讨论。当时参与这些评介与讨论的学人主要有瞿菊农、张君劢、张东荪、张铭鼎等人。20 年代的康德研究者总体可称之为“维新派”，因为他们对康德哲学的评介大都出于“有补于世”的实用考量，力图以康德哲学促成当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贺麟认为，维新派“由于刚接触西洋哲学，中国传统观念，科学知识的水平以及言语上的困难，特别是有政治上的牵连，这些介绍是相当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sup>②</sup> 在此之后的 30 年代中期和 40 年代中期，也涌现出一批康德研究的著作，如周辅成的《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杂志，一卷六期）、吕徵的《康德之美学思想》（《民铎》六卷四期），郑昕的《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洪谦的《康德的先天论与现代科学》（《学原》1947 年一卷六期），此外熊伟、贺麟、牟宗三、齐良骥等学者也都崭露头角。三四十年代的研究者大多有留学背景，所以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海归派”。由于在国外接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他们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较少个人“发挥”与“创造”，而是能够比较自觉地遵循原著来研究与阐释，注重研究的学理性。这一批人在 1949 年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大都成为德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们在该领域内的译介工作，为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1949 年后，康德的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痕迹。当时整个中国的学术研究都被意识形态化，强调学术研究的阶级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展开对西方各种唯心主义及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康德哲学的先验性与观念性，因不符合这两大主义的哲学设定，被否定与打倒就不奇怪了。很显然，这一阶段康德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多少推进，成果仅体现在资料的搜集和翻译上，重要的有：《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重译，1957）、《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三联书店 1957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

<sup>①</sup> 丁东红：《百年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世界哲学》2009 年第 4 期。

<sup>②</sup> 贺麟、洪汉鼎：《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贺麟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载《西学东渐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7 页。

《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王太庆主译, 1960)、《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 1964)。

“文革”结束后, 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 康德哲学的研究进入全面展开时期,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这个时期康德的著作基本上都被翻译过来了, 而且不止一个版本。在研究上, 不再局限于述评, 开始对康德的一些论题有了细致的研究。结构主义、现象学、政治哲学等新的研究视角与范式的引入, 为康德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一时期康德研究的标志性阶段成果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 李泽厚的研究, 凸显了康德哲学的主体性, 认为先验范畴实为人类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 康德所强调的“绝对律令”实际上是对“人是目的”的强调; 康德哲学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人权思想。以此为出发点, 结合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本观点, 他建立了“主体性实践哲学”。对于实践的主体性的强调, 有助于消解当时盛行的庸俗唯物论的影响, 是对长期以来思想领域对于个体、主体忽略的一种反拨, 推动了当时思想界的觉醒与解放。

这个时期康德哲学的翻译取得巨大的进展, 邓晓芒与杨祖陶合译的康德三大批判得以出版, 且都是直接译自德文。李秋零主持的《康德全集》翻译九卷本均已出齐, 而且也是直接译自德文。康德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有了多个版本, 如《纯粹理性批判》有牟宗三、蓝公武、邓晓芒、李秋零、韦卓民等版本; 《实践理性批判》有关文运、韩水法、邓晓芒、李秋零等版本; 《判断力批判》有宗白华、牟宗三、邓晓芒、李秋零等版本。

这个时期重要的研究著作有: 张志伟的《康德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陈嘉明的《构建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杨祖陶、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邓晓芒的《冥河的摆渡者——康德〈判断力批判〉导读》(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戴茂堂的《超越自然主义——康德美学的现象学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黄裕生的《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邓晓芒的《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陈嘉明从先验方法论的角度对康德哲学展开论述, 凸显了康德哲学的方法论性

质；杨、邓的著作立足于原著，以较为通畅的语言，对《纯粹理性批判》做了解读，将康德这本艰深著作的内置理路与思致呈现出来了。邓著《冥河的摆渡者》是一本较为系统介绍康德美学的著作，将康德美学理论的逻辑框架及前后勾连做了扼要的说明。戴著从现象学的角度切入康德美学的研究，视角新颖，凸显了康德审美判断的“还原”与“悬搁”性质。黄著的研究大体上而言也是现象学的路线，尤其受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阐释的影响，将真理与自由问题相联系起来考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邓晓芒推出了一系列对康德哲学经典文本进行“句读”的著作，如《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三联书店2008年版），《〈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之所以特别应该重视这些著作的推出，是因为，这表明当今学界已经意识到西学的研究需要推进到细读与深耕的地步了。

尼采在中国被接受与研究的境况，大致与康德在中国被接受的境况相仿，即民国时期基本上是在以“救亡”与“启蒙”为主题下的读解；1949年以后受意识形态影响，尼采被指责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是阶级压迫的代言人。近三十年以来对于尼采的研究与译介得以全面展开。

在民国时期，与康德的接受和研究略有不同的是，对于尼采学说的接受者与研究者以文学家居多，哲学界的参与热情不及他们。正因为参与群体的不同，对于尼采学说的解读在此时更多的不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呼应时代主题，发扬尼采思想中的个性、创造与批判精神，以利于社会与人生。尼采的思想在此时影响的人，包括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郭沫若。在这其中，尤以鲁迅最为突出。鲁迅的精神底色据说一为：“托尼学说”；一为“魏晋风度”（刘半农语）。此论是否确切自有纷争，但鲁迅受尼采影响之深，不容怀疑。尼采为鲁迅的思想提供的是孤独者的战斗精神（当时称为“个人主义”）、思考者的“批判”与“重估”精神、高贵者的积极与肯定精神以及艺术家的审美人生观。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1907）、《坟·摩罗诗力说》（1907）、《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1908）诸文中对尼采的思想有直接的评介。从中不难看出鲁迅对尼采“赞扬之、崇拜之”（王国维自况）的心态。在30年代鲁迅对尼采的学说持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在1934年的《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中，鲁迅谈道：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是坏事，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予，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鲁迅在此对尼采的“超人”及其“权力意志”（赠予即为权力意志的表现）学说似乎暗含嘲讽。但无论如何，尼采对鲁迅的精神造成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在《呐喊》、《彷徨》、《野草》中都可以看到那个漫游者、孤独者及战斗者的身影。

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六义”，让青年以此“明其是非，以供决断”，其中首条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显然是将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在当时中国语境中做了新的阐释及化用。胡适在1919年《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胡适认为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态度的最好解释。胡适在此将尼采的“价值重估精神”用作冲毁旧道德、旧文明的有力武器。

郭沫若受尼采影响也颇深，他曾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他的《凤凰涅槃》一诗充满了狂热、冲动、激情及对新生的赞美，从中不难看出酒神的身影。对于“酒神”的这种生命强健、秉具权力意志、冲决罗网的精神，郭沫若十分倾心。乐黛云认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对这种不受约束，纯属内在心灵，无目的创造的创造性的‘我要’是很推崇的。”<sup>①</sup>这里的“我要”是指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的“狮子”精神，亦即是权力意志的表征。“狮子”精神即是要摆脱种种传统因袭与重负，为自己争取自由，摆脱一种道德目的论。郭沫若认为：“我们不要不怀什么目的去做一切事，人类的精神为种种的目的所扰乱了，人世苦由这种种的‘为’而发生，我们要无所为而为一切，我们要如赤子，为活动本身而活动。”（《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创造周报》第2号）

茅盾著有长篇专论《尼采的学说》（原载《学生杂志》1920年第七卷），对尼采的生平、著述、道德论、超人学说及政治哲学基本观点等都有

<sup>①</sup>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载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7页。

评述，“代表了当时中国研究尼采的最高水平”<sup>①</sup>。茅盾对尼采的超人学说及权力意志学说均十分认可，但他对这些学说的理解并非完全遵从尼采的原意，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横扫社会上的种种颓象暮气，积极造就高瞻远瞩、英勇善战的新型的人；以权力意志来反对压迫、求得解放、自由与自立。

尼采学说与著作的研究与译介，在1949—1979年间，并无多少推进。据郜元宝《尼采在中国》所录，在此期间，对尼采学说评介的论文只有11篇，而且大多是对尼采学说“反动”本质的揭露。<sup>②</sup>在此期间，对尼采学说的评述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尼采的“超人学说”及“权力意志论”被视为法西斯专政的理论依据，而“四人帮”则被视作是尼采此种反动学说的“新的门徒”。

近三十年来，对尼采的研究得以全面展开。首先是一批尼采的著作得以翻译或者重译，而且不止一个译本，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有尹溟、钱春绮、余鸿荣、黄明嘉、杨恒达、孙周兴等多个译本；《悲剧的诞生》有周国平、缪朗山、赵登荣、杨恒达、孙周兴等译本；《权力意志》有张念东（与凌素心合译）、贺骥、孙周兴、林笳等多个译本或者节译本；《善恶的彼岸》有朱泱、张念东（与凌素心合译）、宋祖良（与程志民合译）等四个译本；《偶像的黄昏》有周国平、李超杰两个译本。目前，杨恒达主译的尼采全集及孙周兴主持的尼采著作全集的翻译都在陆续推出，二者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出两卷）和商务印书馆（已出四卷）出版。

这一时期国内尼采研究的主要专著及论文有：周国平的《尼采与形而上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恒达的《尼采美学思想研究》

<sup>①</sup>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载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4页。

<sup>②</sup> 诸如梁春：《“四人帮”的唯意志论剖析》（《学习》1978年第二、三期合刊）；张桂岳：《“四人帮”权力意志论批判》（《新湘评论》1978年第四期）；张卓民：《权力意志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戴文麟：《法西斯专政的思想深渊——批判尼采“超人哲学”的反动本质》（《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吴增定的《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张文涛的《尼采六轮——哲学与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汪民安的《尼采与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2000 年第 10 期)。周著为其博士论文, 主要依据尼采的《权力意志》一书, 来探讨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论据较为充分, 引用翔实, 是一部较为扎实的论著。其对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与海德格尔的识见相同, 即认为尼采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体系。杨著是较早的一部关于尼采美学研究的专著, 对于尼采美学的观点译介得比较全面系统。吴著基本围绕尼采与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展开, 抓住了尼采哲学较为核心的一面, 对于尼采的《查》与《善恶》二者的阐释, 也颇为到位。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 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尼采学说的经典文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揭示了尼采话语背后未曾显明的“隐微之义”, 确乎打开了汉语思想界研究尼采的新视野。

与当今学界意识到对康德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应推进到细读与深耕相对应, 刘小枫也推出一系列关于尼采学说的“经典”及其“解释”, 主要有“笺注本尼采著作全体”、“尼采未刊文稿选刊”及“阅读尼采”三个系列。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阅读尼采”部分的诸多著作, 全部是国外学者对于尼采学说的诠释与解读, 其用力之深、解读之细、视角之独特非国内学人能及。

#### 四 方法与视角

文本的细读与挖掘是本著采取的基本方法, 引入福柯的视角是本书的一大特色。福柯在《词与物》中将康德与尼采分别视为“现代认识型”与“当代认识型”的代表。所谓认识型 (*l'épistémè; episteme*), 是一个时期组建知识的“元范畴”, 即所有知识得以可能的那个思想范式。福柯认为在某个特定时期内, 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构建自身的方式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它们遵守着相同的知识生产方式, 此种统一性即是认识型使然。李泽厚认为康德的知性范畴并非是先于经验的, 而是长期的人类实践在心理层面的积淀, 只不过其以认识形式这样一种样态表征出